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

郑炳林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刘光华 主 编

谷苞先生

90华诞纪念文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欲平舟

PDG



谷苞先生在 90 寿诞大会上

祝蒼龍院長九旬壽誕

丙戌年夏
新疆北醫科學院同仁敬賀

壽



朱德同志视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谷苞与顾颉刚先生及青年教师在兰州合影



谷苞与费孝通老师交谈



谷苞和林耀华教授合影



谷苞夫妇合影



谷苞和新疆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合影



谷苞和兰州老朋友合影



庆祝谷苞先生九十寿诞暨学术研讨会代表合影

青海民族学院 2000.7.22

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寿联 上联

祝石苞院长九旬寿诞

高山仰止主持民族调查组踏勘瀚海叩荆舍访荒郊
行千里路川水纵逝所撰鸿文见在初给多无一休蓝
圃为和谐各族稳定边疆莫定理论磁石於祈寿永

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寿联 下联

果行行止创建社会科学院康事士林揽英才育俊杰
读万卷书风气所向全院成果斐然无愧人文研究申
心促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营造学术辉煌齐祐康宁

丙戌年夏 新疆社会科学院同仁敬贺

賀谷苞先生九十壽誕

為茲長風度玉龍
母心白髮
伴王山綢堂
民族立功著
回首孫洲斜照妍

丙戌初夏劉光華秦明智吳廷富賀

编辑说明

2006 年是谷老的 90 华诞。

谷老是我国老一辈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他 1916 年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1941 年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毕业后,曾在吴文藻、费孝通领导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并在当地从事社会调查。1944 年返回兰州,在兰州大学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的教学,并在甘肃的陇西、河西和甘南地区进行社会调查。1949 年 8 月兰州解放,先生随解放军进疆,先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工作,后调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工作。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他担任院领导,并长期从事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和西北民族、历史、宗教的研究工作。离休后,先生回兰州定居,兼任兰州大学历史系、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学院教授至今。

谷老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于社会学、民族学的社会调查,晚年主要集中在西北民族、历史、宗教方面的研究,著作颇丰。除出版了《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林则徐在新疆》等专著外,还有散篇文章多篇,大多数选入他的《民族研究文选》。谷老的《民族研究文选》共四册,先后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和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我们研究西北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为了纪念谷老的 90 华诞,2006 年初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发起,经多方联系,最后由西北民族大学和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具体承办,并于 2006 年 7 月 22 日在兰州西北民族大学礼堂会议室,举行了祝贺谷苞先生 90 华诞暨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兰州、乌鲁木齐和银川等地的历史、民族、社会学学者及谷老的学生、好友等 40 余人。会议筹备期间就有出版纪念文集的计

划,并组成了编辑委员会。会后,编委会集中了学者们在会上宣读的文章,一些没有参加会议的学者,也为纪念文集寄来了论文。这就是本纪念文集得以出版的由来。

本纪念文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纪念性文章,这是一些与谷老在学术上有长期接触,深受谷老言传身教影响而写的感受文章。第二方面,是兰州、乌鲁木齐、银川等地高校和研究单位的民族学、社会学学者所写的文章,这是本文集的主体,是作者们从自己的课题中所提供的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第三方面,是以上三地的历史学学者提供的文章。论文作者的年龄有老有小,学术水平有高有低,文章质量方面也参差不齐,但却体现了谷老的同行、学生对他的尊敬和他对中青年学者的鼓励、引导。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西北民族大学谢玉杰书记、金雅声校长和新疆社科院苗普生副院长,对召开祝贺谷苞先生 90 华诞暨学术研讨会和出版论文集提供经济支持,西北民族大学赵德安副书记还主持了学术研讨会;尤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所长,在本文集出版中遇到经费不足的情况时,及时给以解决。当然,具体工作是要人做的,在组织会议方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赵学东院长和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学院的尹伟先院长做了许多工作;从提议组织纪念活动到出版纪念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张克非同志也出力不小。在本文集出版过程中,从征集、审阅稿件到校对书稿,尹伟先、樊保良同志也花费了许多精力。这都表现了后学对谷老的景仰之情。

在本纪念文集出版之际,我们衷心祝愿谷老健康长寿,并继续为社会贡献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经验!

自 传

谷 芭

一

我家祖籍湖南省。我于1916年出生在兰州市一个贫民区。祖父是一个担着筐子卖水果的小贩。父亲是一个买卖破旧衣服、破铜烂铁的小贩。论理,我是没有上学机会的。由于祖辈几代人都不识字,吃过不少苦头,祖父坚持让我上学识几个字,然后再学一门手艺。这样,我便在1923年进入皋兰兴文小学。这是一所私人办的学校,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办学方针的。校董是清朝的进士,校长是清朝的秀才。入学后,我们所学的课程很特别,上午读四书,如同当时的一般私塾一样;下午学习国文、算术、修身、音乐、图画等课程,如同当时的新式学堂一样。这所学校在当时的兰州享有很高的声誉,大概是由于适应了人们在新旧思想的交替中,旧有的封建思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缘故吧!

冯玉祥的部下刘郁芬的军队占据甘肃不久,兴文小学便宣告停办了。我于1927年进入甘肃省立第五中学。在这所学校里读完了两年高小和四年初中。当时随刘郁芬部队一道来甘肃的,有一批共产党员,有的还曾到我们学校里唱革命歌曲,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对马列主义我是听不懂的,只是记住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只知道是革命领袖。这些共产党员深入群众、热情工作、平易近人的作风,是人们以前所未见过的。不久,风云突变,一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至今我还记得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名字。在经济、文化一向落后的甘肃省,五四运动迄未在甘肃省产生过大的影响,延迟到这个时候才开始了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它的播种人就是这批共产党员。我和

我的同学们在这个时候才接受了一点新文化。我们看到妇女放足的运动在这个时候才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男人们头上的辫子也在这个时候被迫剪掉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大舅头上的辫子就是被强迫剪掉的。

我的祖父和父亲本来是打算让我读完初小后学一门手艺的,为什么我又继续读书呢?因为当时没有一个手工业者愿意添一个要吃饭的学徒。刘郁芬的军队占据甘肃以后,提倡种烟,大片的良田种植了鸦片,粮价不断上涨。加之刘郁芬的军队挑起了回汉之间的民族纠纷,又逢多年旱灾,邻近各县的农民大量地涌进了兰州市。这些难民很少有活下来的。我们天天都看到一批批饿死的难民,被用绳索捆绑着抬出城外丢进万人坑。起初死尸还用席子裹着,后来连一片席子也不用了。抬死尸的人也是难民,今天抬着别人丢进万人坑的人们,明天就轮到他们自己被抬着丢进万人坑。还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将别人丢进万人坑的同时,由于自己体弱站立不稳而掉进万人坑死去了。我曾在上学的路上多次看到过瘦骨嶙峋的人吃死人肉的惨景。当时的甘肃省,由于饥饿和民族纠纷究竟死了多少人,并无确切的统计。在这以前常听人说甘肃有 900 万人;在这以后常听人说只有 600 万人了。在短少的 300 万人中,除了少数逃难到邻省外,几乎都被饿死了。在这次浩劫中,我们一家还算是幸存者,只有一个弟弟病饿而死。我们一家能够活下来,主要是靠义仓的平粟粮,也吃过一些马料、榆钱、野菜以及饭馆里丢弃的菜帮、菜根等。

在民族纠纷的严重年月里,当年还是孩子的我们,也受到了当局散布的民族偏见的毒害。在兰州市有两种蚂蚁:一种是黄色的,数量较少而战斗力较强;一种是黑色的,数量较多而战斗力较差。人们说黄蚂蚁代表回族,黑蚂蚁代表汉族。我曾几次被邻近的回族小孩抓去,他们并未打我骂我,只是让我看着他们用手指抹死一个个的黑蚂蚁,我在旁边看着忍不住伤心流泪。当然,我们也曾用同样的方法对付过一些回族小孩,我和这些回族小孩都是近邻,其中有些还是我的同学,后来又是我的好朋友。儿童时代的荒唐行为,每当想起就使我

感到惭愧。后来我在云南省教书和到云南省开会时,曾把我儿童时代的这种荒唐行为,先后告诉过云南省籍的回族著名学者马坚教授和纳忠教授。想不到他们竟告诉我,他们在儿童时代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今昔对比,今天我们各族的儿童都生活在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民族大家庭里,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过着幸福的生活。旧时代的确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在儿童时代所受的民族偏见的毒害,今天的儿童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我之所以费了许多笔墨讲述儿童时代的这些经历,是因为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工作方向。1934年,我在兰州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并于1935年进入了北平清华大学。我的入学志愿原为外语系,后改入社会学系,因为社会学系里设有民族学课程。当时我幼稚的想法,是想通过学习民族学为解决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后来我的全部经历证明,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我上高小和初中时,书籍、文具全部是学校发的。我上高中和大学时的费用,全部依靠公费(奖学金),还能节省一部分补助家用。1934年,我们在兰州市参加会考的高中毕业生只有40人,当时甘肃教育的落后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

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以后,曾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当助教。由于我无意于长期从事人口问题和统计学的研究,便参加了吴文藻、费孝通两位先生主持的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我在这个研究室里工作了三年多,曾两次到云南省贡县的化城镇做过长时间的社会调查,在1942年写成了《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这个书稿曾得到费孝通教授、吴之椿教授的精心修改,我的民族学老师陶云逵教授也给我提出过宝贵的修改意见。三位教授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终身难忘,也可以说是他们把我领进了科学研究的门槛。这个书稿在当时物资困难的条件下,由云南大学印刷的油印本,分赠有关单位的学者。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当

时昆明出版的《自由论坛》和重庆出版的《新经济》等刊物上。当时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杂志摊上》一栏中曾发表文章对作者的社会调查工作进行了鼓励。

由于我当年就有学习藏族社会历史的志愿,于1944年秋天由昆明来到了兰州,在兰州大学教民族学和社会学。1946年,我曾用半年多的时间,到洮河流域和白龙江上游的藏族农村和牧区进行调查并学习藏文。根据调查的资料,写了三十来篇文章,如《卓尼的土司制度》、《朱扎七旗的总承制度》等分别发表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兰州的报纸、杂志上。我本来想在这一地区继续进行社会调查,但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没有能够再继续下去。当年的白龙江上游(即迭部),是武装匪徒们种植鸦片和贩卖鸦片、枪支的乐园,在那里进行社会调查是相当危险的。我曾数次被所谓的“好汉子”阻拦,强索买路钱。当时哪有什么工作条件可言,除了要获得调查资料的热情与乐趣以外,什么也没有。兰州大学给我的全部调查研究经费只有50个银元,许多费用的支出都是靠我和老婆的工资。在洮河上游进行社会调查时,常常独自一人,在荒山野林中一天步行几十里路,晚上就寄居在藏族农民家中,糌粑和酥油茶就是经常的美餐。吃苦和困难并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当地的木材商人和鸦片贩子、枪支贩子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一些藏族头人也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他们曾多次议论过我这个人,不贩烟贩枪图发财,究竟图个啥?!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自己却不能解答,我多次向他们解释说,是为了社会调查,是为了研究藏族的社会现状和历史。对于我的话,他们既不了解,也不相信。一次,一个木材商人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就依你说的,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关系呢?何苦到这里活受罪!”他们的怀疑,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朴实的藏族农民对我的热情接待,对我问东问西的耐心回答,使我深为感激,并使我得到了继续工作的鼓舞。在那个黑暗的年月里,从事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实在是困难太多了。

既然继续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的路走不通,我就只好

到汉族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1948年的暑假至秋季,我曾和西北师院的一位教授、兰州大学经济系的两个同学,在甘肃省的山丹、秦安和会宁县的三个自然村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调查。我曾写过三篇调查报告,即《会宁县韩家集调查》(发表在1948年兰州出版的《西北论坛》上)、《河西——农民的地狱》和《河西农村的崩溃》(发表在当年北平出版的《新路》杂志上)。后两篇文章发表并在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后,受到了当时甘肃反动政府与特务的攻击、迫害。在旧社会,说句真话就会惹祸招灾。

三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当天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兵团的领导同志约我谈话。由于我了解一些西北地区的民族情况,动员我参军到新疆。当时我是兰州大学的副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兴高采烈地脱下长衫,换上军服。在参军的当天,我剃光了自己的长发,下决心改造思想,争取对社会有所贡献。在由兰州向河西走廊行军的途中,部队领导给了我一匹马,并让一位年轻战士照顾我的生活。面对当时多年来出生入死的老战士还在负重步行的情况,我怎么能安然地骑在马上呢!交还马又不可能,为此我拉着马步行,常常掉队,在宿营时部队首长派出同志们不顾疲劳地到处找我。两个月的行军生活,我亲眼目睹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情况、官兵同甘共苦胜利进军的欢乐情况,军官们抢着为体弱和生病的战士背枪支、子弹、干粮的情况……这一切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使我深受教育、深受感动、终身难忘,也是我下决心改造思想、努力工作的一股强大的鞭策力量。我随部队行军,于10月下旬到达乌鲁木齐,起先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任研究员,1956年以后,分别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新疆分局的副院长和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如今,我在新疆工作35年,也可以说我的大半生是在新疆度过的。我在一首习作中曾写过这样两句话:“最是难忘出阳关,青春白头伴天山。”

解放初期,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基本上是在维吾尔族农村和蒙

古族、哈萨克族牧区度过的。其中,三次到南疆十四个县的维吾尔族农村进行过社会调查;三次到北疆五个县的哈萨克族牧区进行过社会调查;两次到蒙古牧区进行过社会调查;一次到民族杂居的乌鲁木齐市近郊进行过社会调查。其中有些调查是结合减租反霸、试行土地改革、试办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等运动进行的。我住在农村、牧区从事调查研究的时间,累计有整整四年多。这期间都是住在维吾尔族农民的土房里和哈萨克族、蒙古族牧民的毡房里。在文革前,我曾和一些青年同志合作,写过四本社会调查报告和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即《巩哈县(今尼勒克县)蒙哈牧区调查》、《南疆农村调查》(第二集和第三集)、《南疆农村社会》和《新疆历史丛话》。前三本是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出版的,后两本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南疆农村社会》已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社会调查资料丛刊》第一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再版了。《新疆历史丛话》一书经改编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近期内再版发行。

上述四本调查报告,记录了解放前后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和哈萨克族、蒙古族牧区的阶级关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在当时对人们了解民族情况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研究民族学、民族史、宗教学、民族经济的同志们也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另外,对青年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也有参考价值。因为书中记录了当时广大农牧民的苦难和欢乐。深感惋惜的是,我有三十几本调查的原始记录,都没有来得及整理,它们连同我已写好的十多万字的宗教问题方面的调查报告,以及我几十年间购置的全部书籍,在十年内乱期间因抄家而散失了。当时拿走这些记录本的同志,虽然帮我查找了几年,却仍杳无下落。这使我深感内疚,当年向我提供这些资料的千百位老人都已作古。一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就使我感到无地自容,因为我辜负了他们的嘱托,没有把他们的话——近代新疆少数民族社会情况,用文字公诸于世。追悔是无济于事的,我曾许下了这样一个心愿:“暮年喜赋盛世赞,鞠躬尽瘁赎前愆。”